

· 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研究前沿问题访谈 ·

全球生态正义的去增长路径探索

——访英国生态经济学者杰森·希克尔

本刊记者

编者按：全球生态危机与全球不平等之间的深刻关联凸显了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层矛盾。在这一体系中，全球北方过度消耗物质与能源，并通过对全球南方的系统性掠夺维持其发展，对生态环境恶化负有主要责任。这一现实要求全球北方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发展模式，削减不必要的生产和消费，加速经济体系的脱碳化，将生产的目的从资本积累转向服务于人类需求和社会长远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全球南方需要摆脱帝国中心国家的控制与剥削，增强经济主权，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目标的经​​济重组路径。这一系列主张构成了国外去增长社会主义（degrowth socialism）理论的核心议题，旨在推动一种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模式。该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围绕全球生态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本刊记者覃诗雅对英国生态经济学者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进行了专访，并整理、翻译了本次访谈的内容。

杰森·希克尔（1982—），英国生态经济学者，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教授，研究重点为全球政治经济学、全球不平等和生态经济学。希克尔出版专著《鸿沟：全球不平等及其解决方案》（*The Divide: A Brief Guide to Global Inequality and Its Solutions*）和《少即是多：去增长将如何拯救世界》（*Less Is More: How Degrowth Will Save the World*）等，在《柳叶刀—全球健康》《生态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参与撰写《健康地球的新政治经济学》《气候之书》《经济人类学手册》等多部书籍的章节。

一、走向生态经济学：从全球不平等到全球生态危机

○（覃诗雅，下同）杰森·希克尔教授，您好！能否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生态经济学研究道路的？从最初研究全球不平等问题到现在关注全球生态问题，您认为二者之间有何关联？

●（杰森·希克尔，下同）我最初是通过研究全球不平等问题进而对生态经济学产生兴趣的。我了解到关于物质和能量流动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中物质和能源使用存在着巨大不平等。处于帝国主义中心的高收入国家消耗了远远超过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大量物质和能源，对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负有主要责任，例如，我们的研究发现，全球北方对 90% 以上所有超过

行星边界^①（planetary boundaries）的排放，以及近 80% 的过度使用物质负有责任。然而，我们知道，气候崩溃对全球南方的影响最大，大部分环境破坏都发生在那里。而在物质使用方面，全球北方国家的高水平消费依赖于从全球南方净占有大量物质。因此，全球北方国家享受着利益，而损害却被外部化了。

这项研究激发了我对理解殖民权力的生态维度以及生态危机的殖民维度的兴趣，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有趣且重要的问题：高收入经济体必须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但如何才能在确保经济稳定和良好社会成果的同时实现这一目标？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如何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并根据国家发展目标重组其经济？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框架。

○您认为全球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面对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不平等和生态殖民化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全球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人们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资本积累需要占有越来越多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在一个国家经济体内，资本对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占有是有限度的，否则就会破坏自身的生态基础，并将工人阶级剥削到革命的地步。为了避免这种结果，资本需要一个外部边界，在那里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劳动力和自然，这就是殖民地产生的背景。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殖民计划的启动是同步的，两者之间并无间隙，它们是同一件事。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正是通过欧洲的殖民计划建立起来的。

欧洲殖民活动的主要目标是摧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主导产业，并围绕种植园和矿产出口重组后者的生产，以服务于宗主国的消费和资本积累。鸦片战争后，欧洲对中国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导致了中国的百年屈辱。面对这种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掀起了反殖民运动，并在 20 世纪中叶成功驱逐了殖民者。在实现政治解放后，这些国家立即着手推动经济解放，通过国有化、产业政策和规划重新控制生产，并将其导向满足人类需求和发展目标的方向。这对于克服资本主义的关键缺陷至关重要——资本只投资于有利可图的活动。在全球南方，资本在供应链中雇佣处于从属地位的廉价劳动力，可能比投资技术开发和公共产品更有利可图。因此，这些投资必须由国家通过某种产业政策来加以引导。这种方法效果显著，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全球南方国家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社会成果也得到了实质性提升。以中国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实现了历史上最快的增长。

然而，全球南方对经济主权的掌控引发了全球北方国家资本积累的危机。随着全球南方越来越多地服务于本国生产和消费，商品供应价格上涨，全球北方国家和企业难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这使得它们难以维持高利润率和高增长率，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危机便是这一情

① “行星边界”（planetary boundaries）是由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öm）等学者提出的生态环境安全框架，旨在为地球系统的可持续运行划定安全界限。该框架界定了 9 个行星边界，分别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生物地球化学流动（氮磷循环）、平流层臭氧消耗、海洋酸化、淡水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大气气溶胶负载和化学污染。这些边界相互联系且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套基于预防性原则的地球生态阈值体系。

况的集中体现。全球北方国家需要以某种方式来恢复帝国秩序，一方面，通过军事干预推翻全球南方的进步、民族主义领导人，如刚果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印度尼西亚的艾哈迈德·苏加诺（Bung Sukarno）等，代之以右翼独裁者，这些独裁者阻碍了后殖民时代的进步改革；另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在全球南方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通过削减公共财政、强行将国有资产和产业私有化以及限制产业政策，破坏全球南方的经济主权，使其在全球北方控制的全球商品链中重新沦为从属地位。后果是，全球南方的发展受到压制，财富被抽干以充实全球北方国家。

因此，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不是由内生条件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分化为中心－外围的结果，其中全球北方国家的发展依赖于对外围的占有。

○您如何定义生态经济学？您认为生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有何差别？去增长理论又是如何挑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

●生态经济学旨在探讨在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实现和增进人类福祉的路径，其主要目标是造福人类和地球。而对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说，首要目标是实现利润和增长的最大化。需要明确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它以资本主义为出发点，以资本积累为目标，不会也不可能超越这一框架。

资本主义是一个高度不民主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生产由资本控制，即由大型金融机构、跨国企业以及占据大部分可投资资产的精英阶层控制。对资本来说，生产的目的不是满足人类需求或推动社会进步，而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资本的持续积累。因此，我们看到了各种扭曲的生产形式，比如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豪宅、快时尚等产品的泛滥，因为这些产品能为资本带来丰厚的利润。然而，我们却长期缺乏必需品，如保障性住房、可再生能源、公共交通等，因为这些领域对资本来说利润微薄甚至无利可图。

这导致我们面临这样的悖论：尽管全球总体生产水平很高，甚至超出了行星边界，但仍有数十亿人无法满足基本需求。为什么？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能力被严重错配。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根据经验，目前仅用全球能源和物质消耗量的 30%，就有可能为全球 80 多亿人口提供体面的生活。体面生活标准（DLS）在文献中被定义为普遍享有医疗保健、教育、现代住房、供暖、制冷、冰箱、冰柜、洗衣机、公共交通、营养食品、卫生系统、计算机、移动电话等基本商品和服务。然而，目前约 80% 的全球人口被剥夺一种或多种基本商品和服务。这种剥夺状况可以很快被终结。在经济民主化的条件下，通过加强对金融和投资的公共控制，我们可以迅速动员生产，确保人人都能获得这些必需品。

去增长理论指出，高收入国家必须减少能源和物质的总使用量。其中一些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这些方面应该获得投资，但最终还需要减少或“去增长”那些非必要的生产，比如快时尚、广告、游轮、武器等。这不仅可以直接减少排放和能源使用，从而加速脱碳进程，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还可以解放生产能力，将其重新分配给更具社会和生态必要性的活动。这一目标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是无法实现的，它只能被视为向社会主义转型的一部分。

事实上，去增长理论从中国汲取了许多经验。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平均水平的 1/5，但中国的预期寿命却高于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已经证明，产业政策和社会主义规划能够使国家更有效地将生产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力量。古巴也是很好的例子，尽管其生产水平低于中国，但其预期寿命却更高，死亡率也非常低。尽管美国对其实施了旨在摧毁其经济的残酷制裁，但它还是取得了相当成就。

二、去增长的核心观点与思想渊源

○您提出“少即是多”这一概念来描述去增长的未来，能否谈谈您的初衷和理由是什么？此外，能否简要介绍下去增长理论的发展历程和基本主张？

●实证研究表明，高收入国家使用不到当前一半的能源和物质，就有可能实现高水平福祉，并推动社会进步。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减少不必要的生产，以及以人类需求和社会目标为导向重组生产来实现。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去增长主张仅适用于高收入国家。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当前的资源消耗仍处于可持续范围内，事实上，这些国家面临的是资源使用不足的问题！它们需要增加资源和能源的使用，以建设增进福祉和实现发展目标所需的基础设施。然而，这种发展需求无法在现行的世界经济结构内得到实现。目前，全球南方国家不仅被剥夺了推行能够带来发展的工业和财政政策的机会，更被迫陷入全球价值链的从属地位，导致资源和财富被耗尽。我们需要的是增强工业主权的策略。在此领域，中国的发展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成功范例。

○可以谈谈去增长理论吸收和借鉴了哪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吗？您认为去增长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

●去增长理论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它主张应围绕社会效益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来组织生产，同时也主张高收入国家必须缩减总产量，将资源利用降到可持续水平，这正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首要举措。如果工人能够掌握生产，那么在知道生产不必要且具有破坏性的产品会破坏我们在这个星球的未来，或者会剥削世界其他地方同胞的情况下，他们绝不会继续这种生产。相反，他们会把生产转向社会和生态迫切需要的领域。因此，原本生产 SUV 的工厂可以转而生产火车，原本编写广告算法的公司可以转而开发节能技术，等等。

去增长理论也深受其他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例如，去增长理论吸收了女性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后者揭示出 GDP 并不能衡量所有形式的社会价值生产，如无偿的护理工作，因此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产出。去增长理论还受到工业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反殖民经济学的影响。

从思想史来看，去增长理论通常被视为源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思想传统，其兴起与《增长的极限》一书所引发的全球性讨论密切相关。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去增长理论中的很多核心观点实际上是由全球南方的思想家发展起来的。例如，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托马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弗朗茨·法农

(Franz Fanon)、朱利叶斯·尼雷尔 (Julius Nyerere) 都指出, 全球北方的资本主义增长依赖于对全球南方的新殖民主义掠夺。他们呼吁全球北方减少总生产和消费, 以结束这种掠夺和更公平地分享地球资源。他们还主张, 发展本身不应该是增加总产出, 而应该是增加人类进步所必需的特定生产形式。对他们来说, 关注人类需求而非奢侈消费, 是增强自力更生能力, 进而实现真正经济主权的关键所在。这一思想传统理应被铭记。

三、去增长的挑战与应对举措

○去增长理论有别于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执念, 因此不可避免会引起一些误解和担忧。譬如, 去增长是否会引起就业岗位的减少, 是否能够保证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 以及是否能够带来人类的福祉?

●这些问题在我已发表的著作中均有详细论述。以失业问题为例, 如果减少不必要商品的生产, 将导致失业。但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建立与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关的公共就业保障体系。这确保了任何有意愿的人都能接受培训并参与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项目: 发展可再生能源能力、扩建公共交通、修复生态系统。要实现社会和生态目标,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资本因无利可图不会介入。因此, 需要公共财政来引领方向, 直接雇佣劳动者从事必要的工作。这样既能杜绝任何形式的失业, 又能确保每个人都有体面生计。公共就业保障能为整个经济体系设定劳动基准, 包括生活工资、良好的工作条件、工作场所民主, 因此可以迫使私人企业也达到这些标准, 否则将面临员工流失的风险。公共就业保障是将劳动力从不必要的生产和资本积累转移到社会必要活动的有效途径。

另一项重要政策是普遍公共服务。这里的公共服务, 不仅包括医疗保健和教育, 还涵盖住房、公共交通、清洁能源、水资源、互联网、托育、文娱设施、营养食品等。我们需要统筹生产, 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维持福祉所需的核心商品和服务, 而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这样既能稳定经济, 又能实现人类福祉与经济增长脱钩。普遍公共服务能消除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夯实社会基础, 破解生态政策的政治僵局。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如何缩减化石燃料和其他问题行业, 而无需担心受到伤害。它使我们能够以更理性的态度看待经济。因此, 这些社会政策需要被置于首要和核心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政策深得民心。无论是公共就业保障、生活工资、普遍公共服务, 还是以人类福祉和生态取代资本积累的经济模式, 多项调查显示, 民众对这些理念的支持度极高, 几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公民大会也呼吁此类转型。

○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您认为我们应该为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 1.5℃ 以下采取哪些举措?

●目前, 我们未能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形势十分严峻。主要问题在于, 高收入国家未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实现脱碳, 无法保持在碳预算的公平份额内。这些国家必须加快减排步伐。

进展如此缓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高收入国家的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使得快速脱碳难以实现。高能耗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建设必要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来满足需求。这就是为什么高收入国家减少总能耗如此重要，因为这可以使它们更快地实现脱碳。第二个原因是资本没有对绿色转型进行必要的投资，因为这类投资利润不足。虽然可再生能源成本低于化石燃料，但化石燃料利润更高，因此资本持续投资于化石燃料。显然，公共财政必须在实现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因此，依据经验，如果高收入国家减少能源消耗总量，它们就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实现脱碳，从而保持在碳预算的公平份额内，并使我们能够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 以内。这无疑是个积极信号，但前提是要对现有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改变。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问题，绿色增长作为一种方案被提出来。您认为这种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这种方案能否实现它所承诺的双重效应，既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解决经济增长与生态问题之间的紧张关系？

●绿色增长是指高收入国家在保持 GDP 增长的同时，将排放和物质消耗降至可持续水平。有些人会指出，许多国家在 GDP 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也有所下降。但这本身并不是绿色增长。需要的不仅仅是任何程度的减排，而是必须在 2050 年实现零排放。目前，没有任何高收入国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即使是减排表现最好的国家。按照当前的减排速度，高收入国家平均需要 200 多年才能实现零排放。这根本谈不上绿色，简直是灾难！高收入国家必须大幅加快减排进程。

那么，是否有可能实现快速减排？在绿色增长方案中，全球北方通过抑制全球南方的能源使用或依赖大规模负排放技术来达成这一目标。然而，这两种假设都不可接受。如果我们排除这些选项，那么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富裕国家必须减少能源消耗总量。

○是否可以谈谈债务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债务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从债务方面着手推动去增长运动？

●任何对外部债权人的债务都必然伴随着增长需求。如果一个国家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华尔街的钱，那么它不仅要偿还本金，还必须支付利息，这实质上意味着资源的净转移。然而，如果债务仅是公共财政赤字，即一个国家欠自己的债务，那么就不存在这种强制性要求。这只是一种会计记账方式。

关键是要明白，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生产。如果依赖外部融资或私人融资进行生产，那么就得按照资本方的意志行事：资源掠夺、血汗工厂、种植园经济等。总之，资本会流向利润最高的领域，但这不会带来真正的发展。相反，如果能更多地依靠公共财政，那么就可以对生产内容和生产目的拥有更大自主权。

四、通向后资本主义世界

○您认为人类对于经济增长的痴迷使我们陷入了生态崩溃，资本主义必然把人类带入大灭绝

时代。这是否意味着要摆脱“增长主义”的束缚，必须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变革？

●是的，显然基于上述原因，社会和生态危机无法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到解决。我们需要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型，这样才能更直接地围绕确保人类福祉和实现生态目标所需的要素来组织金融和生产。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曾说，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容易^①。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说，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比想象后资本主义的未来更容易？但去增长理论无疑属于后者，如何去构想一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

●生态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相当明确，包含三个核心层面：首先，普遍公共服务必须覆盖社会关键领域，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其次，允许存在私营企业，但这些企业必须是后资本主义性质的，即实行民主所有制和/或民主管理。这种安排确保工人和社区在生产决策和劳动条件方面拥有更大发言权，并能引导生产更好地服务社会。最后，对金融进行更大程度的民主管理。这部分可以通过信贷引导框架实现，以减少对破坏性和非必要领域的私人投资，同时引导信贷流向更重要的领域。但还需要建立公共财政体系，以确保即使在不盈利的情况下，必要生产和创新也能获得投资。

具体谈谈信贷引导。在现行经济体系中，商业银行决定信贷分配，而信贷促进生产。现在，商业银行随心所欲地进行投资，而不考虑这些投资是否有害。信贷引导框架就是对商业银行设定规则，以限制流向问题行业的信贷数量，从而减少这些行业的生产。因此，信贷引导既可以作为依据有约束力的年度计划减少化石燃料消耗的关键工具，也可以用来抑制有害行业的发展，同时引导投资流向更有益于社会和生态的生产领域。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信贷引导在 20 世纪中叶被广泛应用，对加快绿色转型至关重要。现在正是重启这一原则的时刻。

我们可以这样思考这一问题。金融支配着对集体劳动和生产能力的分配，从而决定了生产什么。基于这一现实，我们应该对投资施加必要的民主管理。但现行体制却让大众受制于大银行的支配。信贷引导框架则可以使我们能够引导投资，确保实现公众议定的目标。

○最后，能介绍一下您最近在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吗？

●近期我主要致力于研究两个领域：一是研究不平等交换的动力机制，量化中心国家如何从全球南方掠夺大量资源、土地和劳动力。二是发展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出的“脱钩”策略，使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减少对全球北方国家进口和帝国货币的依赖，增强经济主权，促进南南贸易。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可以提供实践范例，还可以为南南团结创造机会，这将有助于打破世界经济的帝国主义结构，助力全人类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生态文明。

（覃诗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乔瑞华]

^① Fredric Jameson, *The Seeds of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xii.